

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抉择

——论吴三桂降清

刘 凤 云

在明清鼎革的剧烈社会变动中，故明官吏的降清乃是十分普遍的现象，由于他们各自情况的不同，对历史所产生的影响也就不同。其中，似以吴三桂的降清最令人瞩目。所谓“开关迎师”，即是把吴三桂的降清同清军入关、定鼎中原的大业联系在一起，吴三桂于清王朝可谓功高无量。然而，由于吴三桂降清复叛，向为清人贬抑，明人又因吴三桂献关迎师，甘为异族鹰犬，痛加责伐。而后人在评论吴三桂降清时，亦因各有自己的见解，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吴三桂的降清，无疑在明亡清兴的历史变革中起了重要的作用，进行深入研究，有利于揭示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本文不拟品评历史人物的功过，只想通过一些历史现象来探讨历史人物的思想行为与活动轨迹。还望史界学者指正。

一、明清兴亡中的一个特殊人物

明末清初的政治风云，造就了一批特殊的历史人物，他们个人的思想行为，往往直接影响到历史的进程，吴三桂就是其中的一个。

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中后所人，祖籍江南高邮。父亲吴襄是明天启年间的武进士，累官至总兵。舅父祖大寿是明末辽东军事集团中的主要将领之一。吴三桂于崇祯初年中武举之后便承袭父职，官都督指挥，继之又任游击，副将，崇祯十二年（1639），洪承畴总督蓟辽，奏请朝廷升任辽东团练总兵官，年仅二十八岁。这时的吴三桂只不过是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个普普通通的武将，然而，一场决定明清生死存亡的战争——松锦之战，将吴三桂推到了政治舞台的显耀位置。

松锦之战，是清王朝实现其入主中原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自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登基称帝，同年出兵臣服朝鲜，解除了与明争战的后顾之忧，此后便全力与明争夺辽西走廊，也就是明人所称的宁锦防线，而锦州则首当其冲。崇德三年（1638），清军屯田义州，接着包围了锦州，关外的形势处于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状态。次年，随着明朝命“剿抚有方”的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由镇压农民军的烽火前线赶往辽东，明清松锦之战的帷幕也就由此渐次拉开了。

这时的吴三桂仅仅是一名前锋右营副将，但战争首先给他带来了官运。洪承畴到任后，为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对宁锦防线的军事部署作了重新调整，他从各营中抽选部分士兵，暂署山海关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进行集中训练，称作“团练”，并以吴三桂武艺精湛用为署团练总兵官。这年十月，清军在豫王多铎和肃王豪格的率领下袭击锦州及宁远，宁远总兵金国凤出战于城北山冈，因后援不继阵亡，吴三桂补授宁远总兵官缺。而宁远则是明朝在辽东仅次于锦州的战略要地。

当时，明朝在关外的守将，锦州为前锋总兵祖大寿，宁远为团练总兵吴三桂，前屯卫为署分练总兵刘肇基，官兵共计六万五千余人，①分驻于山海关外的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中前所八城之间，以中前所藩屏门户，兵力最厚。所以，虽然祖大寿所部人马被困锦州，明军仍未失之优势。但是崇祯十三年（1640年）春，皇太极亲临前线，加强了对锦州的围困，同时伺机进占松山、杏山，形势开始于明不利。驻守在宁远的辽东巡抚方一藻急令吴三桂与刘肇基各率马步兵五千余人驰往松山、杏山，阻击清军的增援部队。五月十八日，吴三桂和刘肇基即与清军交战于杏山城北，明军始居优势，但清军尤其勇猛，反败为胜，激战中，吴三桂的裨将杨伦、周佑、李德胜等皆战死，所部伤亡千余人。阻击失败了，但吴军之勇已为人所共知。七月，洪承畴统领东协总兵曹变蛟，山海关总兵马科赶往杏山，合吴三桂、刘肇基，共四镇兵、二万余人，与多尔袞、豪格所率清兵再次战于杏山城北。明军由于兵力大增，“胆勇倍奋，士气益鼓，连战数合”。吴三桂执锐死战，连连夺功，终于大胜克捷。②是役，吴三桂又一次崭露头角，更为洪承畴器重。

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吴三桂从所部二万余人中，遴选出精甲一千骑，组成一支生死不惧的先锋营，由他亲自训练，亲自指挥。这支先锋营共分为二十个队，“五十骑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千兵共领骑二十人，置签二十枝，书领骑姓名插靴筒中。遇急，信手掣签，呼某，某即统本骑随之冲突，往无不利。”③因而，吴三桂所率宁远镇兵，也是洪承畴所统诸镇中最强的一支。

可是，援锦之战的进展并不顺利。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四镇兵在杏山一带击败了多尔袞、豪格后，“与清相拒四阅月，至十一月退还，分守各卫。”④原因是清军改变了以往攻城掠地的战略，实行屯驻政策围困锦州，这便注定了这场战争的旷日持久。洪承畴亦“欲屯田为久驻计”，稳扎稳打，步步进逼，直至把清军逼回辽东。但是，朝廷中以兵部尚书陈新甲为首的部分官员，却因农民军在中原地区的迅猛发展，力主速决辽东战事，全力铲除心腹之患。朝廷中“科道官交章责承畴师老饷匮，观望不前”。于是，一向宠信洪承畴的崇祯皇帝终于为之所动，诏命洪承畴克期进兵。

崇祯十四年（1641），松锦之战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明朝为摆脱东西交战的困境，不惜抽调三边劲兵，悉锐而出。三月，宣府总兵杨国柱、大同总兵王朴、密云总兵唐通各率兵至，与玉田总兵曹变蛟、薊州总兵白广恩、前屯卫总兵王廷臣、山海关总兵马科、宁远总兵吴三桂，凡八大将，合兵十三万，马四万，云集宁远待命。⑤七月，洪承畴以八镇精兵的优势，步步为营地逼近锦州城南。他设帐于锦州八十里外的松山统筹指挥，将步兵七大营列于松山东北，又布骑兵于松山西北三面，其势甚锐。

就在明军援锦破围之战进展迅速之际，皇太极于沈阳接到告急的军报，他不顾鼻血涌流，悉索全国人丁，昼夜兼程赶到锦州，即“登山观兵”。皇太极“横窥洪阵久之，见大众集前，后队颇疏，猛省曰：‘此阵有前权而无后守，可破也。’”⑥于是，连夜命令所部驻扎于明军部署薄弱的松山与杏山之间，自乌新河南山至海，横截大路，绵亘扎营，浚以深濠。如此一来，松山明军的后路便被切断了，而明军的粮饷则必须自宁远经由塔山、杏山、再运到松山。当洪承畴发现了清人的这一举动，正在调兵遣将极力补救之时，清军又意外地夺取了明军屯积在松山以东笔架山上的随军粮草。于是，明军陷入了后援不继，粮草枯竭的困境中。再加上连战两日皆不利，军心开始动摇，将领们多主张先回宁远就食，再定战守。连监军张若骥也认为“各帅既有回宁远支粮再战之议，似属可允。”⑦百般无奈之下，洪承畴决定突围，计以王朴、

白广恩、唐通为左路，吴三桂、马科、李辅明为右路，破围回宁远就食，自率曹变蛟、王廷臣守松山，待突围之军携粮归来再战。“申时传令撤兵就饷，酉时起行。”^⑧

不料，大同“总兵王朴怯甚，已先遁，于是各帅争驰”，^⑨吴三桂最先追随王朴而逃，完全打乱了洪承畴原定的突围计划。其结果，溃围的明军全部陷入清军的伏击中。清军于杏山、塔山、高桥等处沿路追杀，并“行猎山野”，“搜剿遁敌”，自八月二十一夜至二十九日，将逃亡的明军斩杀大半。据《清实录》记载：“是役也，计斩杀敌众五万三千七百八十三，获马七千四百四十四，骆驼六十六，甲冑九千三百四十六副。明兵自杏山南至塔山赴海死者甚众，……海中沉尸漂荡，多如雁鹭。”^⑩按此推算，侥幸逃出的人马当有三四万人，但皆已溃不成军。如最先逃出的王朴与吴三桂，在高桥中伏，“仅以身免”，兵卒“各路溃窜”。^⑪唐通受困于杏山，待清军大规模搜捕结束后，才由海上辗转逃回。^⑫李辅明等也是一路落荒，入杏山不得，入塔山亦不得。可见，这场漫无组织的溃遁，不仅使明军丧失了六镇精兵，且输掉了斗志，注定了在这场战争中的失败。而吴三桂追随王朴率先逃跑，罪责难逃。

可是，数月之后，“朴被诛，而三桂仅镌秩”，^⑬得到的是罚不当罪的降三级的处分，“收兵仍守宁远”。^⑭随后，又晋升辽东提督。“三桂既加提督，则主客援兵皆听提调”。^⑮这种恩遇出自刻薄寡恩的崇祯皇帝，实在不可思议。

实际上，崇祯不治吴三桂罪，反而委以重任，原因主要在于明王朝于松山溃围中已丧失了可以支撑自己统治的军事力量。

明朝自永乐迁都以来，军事力量的重心便开始北移，崇祯时，更是形成“敢战官兵皆在北而不在南”的局面，而在这些敢战的官兵中，尤以三边的“塞上之兵”最强。可是，正是这些精兵强将，除了宣府总兵杨国柱等战死疆场外，其余多败亡于这次溃逃中。此后，明朝再也无力组织起一支可与清军抗衡的援辽大军，最终导致坐观松锦诸城为清人所得的败局。

此外，明朝不仅时事周章，而且“人才脆薄”。时人计六奇在论述明亡的四点原因时，曾提到“将相无人”。就辽东的守备而言，明朝主要依靠以祖大寿为首的祖氏军事集团。所谓“盖敌人素所畏忌者，唯祖大寿一人，辽东半壁，实倚赖之”。^⑯但松山溃围后，不仅困在锦州的祖大寿突围无望，且以“善用兵”闻名朝野的洪承畴并其旧部二骁将曹变蛟和王廷臣也陷围松山。于是，在尚存的蓟辽诸镇中，崇祯只有依靠素有勇武之名，且为祖氏旧部的吴三桂了，寄以拱卫辽东的重任。而朝廷内外也多以为，“三桂年方及壮，勇冠诸军，北门锁钥，藉无恐”。^⑰可见，大明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不仅使吴三桂免遭杀身之祸，且把他推到了显赫的位置，由一个区区边关总兵，被倚为国家干城。

崇祯十五年(1642)二月，松山守将夏成德开城降清，三月锦州复降，七月，杏山、塔山也相继落入清人手中。自此，明王朝苦心经营十余年的宁锦防线被清军攻破，关外八城仅余其四，宁远则成为明朝抗击清军的前沿城堡，吴三桂的地位更加醒目。这时，如果吴三桂降清，辽西走廊的大门就将全然为清军打开，八旗铁骑便可直取关门。“关宁一破，燕京震动，必致南迁，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⑱而吴三桂在明，明朝虽失锦州重镇，边关依然有宁远藩屏，朝廷无东顾之忧。可见，吴三桂已成为明清战争中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清人自然意识到这一点。自松锦城下，洪承畴、祖大寿先后降清，清朝的统治者们便开始计议招降吴三桂，收取宁远的问题。而为了招降吴三桂，皇太极在对松锦两城的官兵、包括巡抚丘民仰、总兵曹变蛟、王廷臣进行残酷屠戮的同时，却不顾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等人的反对，“留养”了在大凌河“背盟弃约”的祖大寿及其弟祖大乐。其中一个很深的用意，是为了感化吴

三桂，正如他自己所说：“朕以大兵围困松锦，……抗命者尽行诛戮，唯祖大乐等因系将军（吴三桂）之戚，姑留之。锦州祖大寿归命，其眷属部众俱获保全”。^{①⑨}随后，派出祖大寿的亲眷前往宁远说降。崇德七年（1642）四月八日，皇太极又以大清皇帝的名义书谕招降，令人投书宁远，曰：“曩者祖大寿之在锦州也，尔明国皇帝每疑之，而欲加以罪，然而终不能者，以其族党甚强，且据锦州故也。今将军以孤立之身，负危疑之迹，岂能自保无虞。况尔明国流寇转炽，土宇凋残，倾亡之象，将军已目击之。时势若此，将军虽勇，一人之力其奈之何哉？将军不于此时翻然悔悟，决计归顺，劳我士马，迟我时日，彼时虽降亦不足重矣。”^{②⑩}与此同时，命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等分别从故旧和亲眷的角度致函劝说，晓以利害。招降的攻势甚猛。可是数月过后，仍没得到吴三桂的回音。皇太极并不甘心，十月，他在派遣贝勒阿巴泰入明行掠的同时，再次致书吴三桂招降，并附以祖大寿的亲笔，“使大寿书招宁远总兵吴三桂。”皇太极如此重视招降吴三桂，是因为夺取宁锦，是他入主中原战略计划的第一步。在伐明上，他一直主张先取关外锦宁，拆除山海关屏障，则山海易得，进入中原可长驱直入。但吴三桂“答书不从”。^{②⑪}于是，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年）正月，第三次颁敕招降，声言：“今我军围困宁远，不知更有何处援兵以解将军之厄耶？若不乘此时急图归顺，勉立功名。俟我国蒙天眷佑，南北两都皆为我有，曩尔宁远岂能独立乎？逮至糗粮罄绝，阽危待毙之际，将军悔不可追矣！”^{②⑫}此时，清军虽未出兵宁远，但祖大寿已提议“发兵中后所，收三桂家族，”^{②⑬}宁远之战，为期不远。但皇太极未及发兵便死去，直到是年九月，清廷仍然得不到吴三桂的回音，郑亲王济尔哈朗才统兵扫荡关外诸城，接连攻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到宁远为吴三桂所败。宁远成了关外孤城，但作为明朝的雄镇，它阻挡了清军入主中原的步伐。

吴三桂拒绝清人的招降，不外有两个原因：其一，大清毕竟为夷狄，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华夷之辨的传统观念，在汉人的头脑中已根深蒂固，吴三桂也不例外。其二，明王朝虽已风烛残年，但对仅据东北一隅的清政府来说，依然不失君临天下之势，在这场争夺中，鹿死谁手还远远未见分晓。何况，他此时正为明帝倚重，身兼提督全辽大将军之职。

二、偶然因素的决定作用

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北京，腐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于农民战争的烈火之中。已封为平西伯的吴三桂因勤王不及，于三月二十二日退守山海关，开始了他一生中矛盾复杂，而又富于戏剧性的历程。

这时，中国大地依然存在着三股政治军事力量的角逐，即已经攻占北京的大顺农民军，雄据关外、意欲入主中原的清王朝，以及散在江南、处于群龙无首状态中的明朝残余武装。吴三桂作为明朝在北方仅存的一支军事力量，已处于农民军与清军两大势力的夹击中，在与南方声息不通的情况下，吴三桂以其三四万的兵力不堪与其中任何一方相抗衡，更不用说东西两面同时作战。而政治上的孤立无援，经济上的粮饷俱乏，也决定了吴三桂不可能长此独立存在下去。何去何从？他必须在投降农民军与清军二者之间作出选择。

降清，自然不失为一条出路。上级洪承畴、舅父祖大寿，并昔日的同僚皆在清廷供职。但是，清人的招降均被吴三桂一口回绝，宁远攻战，他又击败辅政王济尔哈朗，自觉与清人积怨颇深，“以清兵仇杀多次，不欲返颜。”^{②⑭}而且，对清人来说，吴三桂确实是“劳我士马，迟我时日”，因而，他不得不担心，此时“虽降亦不足重矣”。这重重顾虑，使吴三桂不到万不得已

是不会降清的。

在这种情况下，投降大顺农民军似乎成了吴三桂的最佳选择。而与清军比较，大顺农民军对吴三桂又确有较强的诱惑力。

第一，李自成许以高官厚禄。三月十五日，大顺农民军进抵居庸关后，李自成收降守将唐通，旋即命唐通率所部并银两财物，以故旧同僚的关系前往山海关招降吴三桂，以“致之麾下”。“通遗三桂书，盛夸自成礼贤，啖以（吴三桂）父子封侯。”^{②⑤}这封侯之赏的许诺，不能不使吴三桂动心。

第二，李自成派人送去了四万两犒师银，立解军中的燃眉之急。吴三桂的军队在宁远时即已缺饷达十四个月之久，顿驻山海关后更是饷断粮尽。

第三，李自成进入北京后，继唐通又先后派出巡抚李甲、兵备道陈乙前往山海招降，并“令诸降将各发书招三桂。”^{②⑥}明密云巡抚王则尧，曾任辽东监军的张若骥，以及左懋泰等均书函劝降，招降的攻势甚猛。

第四，吴三桂的父亲吴襄、母亲祖氏，以及爱妾陈圆圆等一家三四十口，均在京城，已沦为人质，牵制了吴三桂的行动。京城陷落后，李自成首先缉捕了提督御营的吴襄，迫使其归顺，“作书以招子”。^{②⑦}吴襄书中曰：“我为尔计，及今早降，不失封侯之位，而犹全孝子之名。万一徒恃愤骄，全无节制，主客之势既殊，众寡之情不敌，顿甲坚城，一朝歼尽，使尔父无辜并受羞辱，身名既丧，臣子俱失，不亦大可痛哉！”^{②⑧}所言切中利害。吴三桂素有孝子之名，对乃父的处境不会无所顾忌。更主要的是，对吴襄归顺农民军，吴三桂早已有言在先。据明太监王永章记载：当吴三桂得知京城陷落后，即致书吴襄曰：“京城已陷，儿臣拟退驻关外，倘已事不可为，飞速谕知。家中俱陷城中，只能归降”。^{②⑨}

第五，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即明王朝已无可挽回地从历史上消失了，在这场争夺天下的斗争中，大顺农民军已占领北京，似有取明代之，为一代新主之势。在这新旧鼎革之际，投降农民军，可永保荣华富贵。这也是“识时务者”在改朝换代中的通常选择。

总之，对吴三桂来说，此时只有投降农民军，才不失为一条万事皆遂的出路，即势所必然。而事实上，吴三桂也确实作出了这种选择。

据记载，当大顺政权的招降使者到达后，吴三桂集诸将问策说：“都城失守，先帝宾天，三桂受国厚恩，宜当以死报国。然非藉将士力，不能以破敌，今将之若何？”又说“闯贼势大，唐通、姜襄皆降，我孤军不能成立。今闯王使至，其斩之乎？抑迎之乎？”当众人答道：“今死生唯将军命”时，“三桂乃报自成”，^{③⑩}将山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的代表唐通驻守，亲统大军，“卷甲入朝”。一路，吴三桂“从关上至永平，大张告示，本镇率所部朝见新主，所过秋毫无犯，尔民不必惊恐”。^{③⑪}

由于“江川前知县李某、永平人，言亲见告示”，^{③⑫}故吴三桂于明亡之后面对军民军和清军两大势力，先是投降了大顺农民军当是事实。这在晚明的许多史籍，乃至清人的官书中均有记载。只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发展下去。四月五日，当吴三桂率军抵达永平以西的沙河驿时，途遇由京城逃出的吴府家人。于是，“忿而中改”，^{③⑬}勒转马头，再次返回山海关。

对于吴三桂降李又中途返回，封建文人向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吴三桂因其爱妾陈圆圆为大顺农民军将领刘宗敏掠去而怒改初衷。如《清史稿》记载说：“三桂引兵西，至滦州，闻其妾陈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怒，还击破自成所遣守关将。”^{③⑭}《清史列传》记载说：三桂“悦歌女陈沅，以千金购之，……至是，为贼将刘宗敏掠去。三桂闻之，作书绝父，驰归山海关。”^{③⑮}

明末诗人吴梅村还特赋《圆圆曲》一首，笔调尤其浓郁。诗曰：“顶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痛哭六军皆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从此，“冲冠一怒为红颜”脍炙人口，似成这一事件的定论。此外，《明史》、《平寇志》、《四王合传》，以及《庭闻录》等书均持此说。庭闻录的作者刘健还强调说：“陈沅沅事言者多殊，……唯吴梅村《圆圆曲》为得其真。当日梅村诗出，三桂大惭，厚贿求毁板，梅村不许。三桂虽横，卒无如何也。”另一种说法认为：大顺农民军实行了追赃助饷政策，拷掠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导致了吴三桂的返悔。如张怡在《澠闻续笔》中说：“贼得京师，召三桂。至永平，闻其父大将军襄为所系，索饷二十万，乃惊曰：‘此诱我，剪所忌耳！’乃率兵还。”^{②6}程源在《孤臣记哭》中也说：“逆闯急于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三桂闻京城，得状，乃以兵出关。”^{②7}此外，钱帜亦持此说：“三桂统师入关，至永平西沙河驿，闻其父为贼刑掠且甚，三桂怒，遂从沙河驿纵兵大掠而东，所过糜烂，顿兵山海城，益募兵议复京师。”^{②8}凡此等等。

近年来，学者或认为：故明遗老和反清志士渲染陈圆圆一事，是为了讥讽吴三桂叛明降清，而清人则出于对吴三桂仕清叛清，反复无常的恶恨，用以贬低他的人格。“实则此事对当时的形势并无多大影响。因为在封建帝王时代，女子本来就是赠送人的礼品，随时可以用钱买到，吴三桂也不会为一个歌女而如此大动干戈。”“所以，吴三桂降李复叛，是因为得到了李自成在北京拷掠明官的情况和父亲被拷追赃的密信。”

应当承认，李自成在北京所实行的对明朝官吏的索饷，确实产生了很坏的影响，由于索饷的范围过宽，手段过严，致使人人自危，降者思悔。据计六奇记载：“贼派饷各官，无论用否，俱责如言，不办即夹。……人人皆得用刑”。而且，“满街遍捉士大夫拘系，行路之人如汤鸡在锅。”^{②9}这些降官降将本欲归顺新朝以求显贵，不料，不仅钱财尽空，且时遭刑掠，“存亡莫测”。这对于踌躇满志、正走在投降农民军路上的吴三桂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是他始料所不及的。特别是吴襄也在被拷掠之列，尤其令他难以接受。因而，家财丧失，老父被系，不能不使吴三桂对农民军产生不满、愤怒、乃至困惑，进而对大顺政权感到失望与格格不入。可以说，李自成对明朝官吏刑掠和吴襄被逮，的确是吴三桂降李复叛、最终导致降清的重要原因，或根本的原因。但在当时这只是一个潜在的原因，而陈圆圆的被夺，则在吴三桂的这一转变中起了不可忽视的决定性作用，它诱发了潜在的原因，促成了转变的发生。

由于陈圆圆被夺一事的重要，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陈圆圆及她在吴三桂心中的分量。

陈圆圆，名沅，字畹芬，明末苏州名妓，与顾寿、董小宛、李香君等齐名。据记载：她“容辞闲雅，额秀颐丰”^{③0}，善南戏弋阳腔，居“梨园之胜”，故以色艺双绝艳名远播。在明末士大夫侑酒狎妓以为时尚的风气下，风流倜傥的吴三桂虽投戎北边，远隔千里，却也慕名垂青，使人以重金往购。但是，国丈田弘遇捷足先登，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春去南海焚香，归途经过江南时，以高价购得陈圆圆，并将其带回京师。吴三桂空忙一场，不免大失所望，心中痒痒。

但是，吴三桂与陈圆圆可谓有缘。崇祯十五年（1642年），清军大举深入，残破畿南，饱掠山东三郡六十余州县，于次年满载北归。明朝以大学士周延儒督师，会八镇官兵于螺山（怀柔北）阻击清军。但八镇兵多败绩，所谓“诸将徘徊不战，唯吴三桂入关数战，斩一头目，杀伤略相当。”^{③1}为表彰有功将领，五月，崇祯召见吴三桂与山东总兵刘泽清、山海总兵马科，赐宴武英殿。于是，朝野皆以吴三桂为国家栋梁，连国丈田弘遇也邀结之，“钱之甲第，出女乐佐觞，圆圆亦在拥纳之列。”^{③2}吴三桂由此结识了陈圆圆。所以，吴梅村《圆圆曲》有“相见初经田窦家”之句。

或许因为思慕已久，或许因为可望而不可及，见到了陈圆圆后，向以忠勇著称的吴三桂完全丧失了理智。据陆次云的《圆圆传》记载，田弘遇问他“设寇至，将奈何？”吴三桂则答道：“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而后，吴三桂因得到崇祯的命令，“帝促其出关”，^{④③}未及迎娶，便留下千金为聘，返回宁远。这年十一月，田弘遇死。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吴襄奉命提督御营，入京之后，便将陈圆圆接到府中。所以，短暂的相见，随即便是半年有余的别离，更增加了吴三桂对陈圆圆的渴慕，即使在朝廷危殆、戎马倥偬之际，吴三桂也没有摆脱这份思念。他不时寄书父亲吴襄：“祈告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陈妾安否？甚为念。”^{④④}鸿雁帛书频繁地飞往京城。

由此可见，陈圆圆对吴三桂来说，绝非寻常女子可比。她在吴三桂的心中，更重于国家社稷、忠义名节。而未及迎娶，又无形中增加了她对吴三桂的诱惑力。所以，尽管封建制度下，歌妓舞女可以随意买卖赠送，但在当时，吴三桂是绝不肯放弃陈圆圆的。何况，虎口夺食的又是“有求于他”的大顺农民军呢！

正因如此，当吴三桂已经踏上西进之路后，虽对大顺农民军的追赃政策极端不满，对李自成索掠其父的无礼行径十分恼怒。但他仍然对农民军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这一切都是农民军招降的一种手段：时人笔下记载了吴三桂当时对此事的反映，所谓“李害父陷于不知，不必仇”。^{④⑤}“吾至当自还（家产）也，”“吾至当即释（吴襄）也。”^{④⑥}可是，当他得知刘宗敏将陈圆圆由吴府掠走的消息后，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也被摧垮了，他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三十三岁的吴三桂还在血气方刚之年，他那潜隐的不满，终因爱妾被他人强占而爆发。对于吴三桂当时的愤忿之情，史书中也不乏记载。如《庭闻录》曰：三桂厉声高叫道：“大丈夫不能保一女子，何面目见人耶？”^{④⑦}《吴三桂纪略》曰：“吴三桂声称，‘不杀权将军，此仇不可忘，此恨亦不可释。’”^{④⑧}然后率兵急奔山海关。

综上所述，大顺军进入北京后，实行了追赃助饷的政策，它有别于历代开国的封建王朝，体现了农民政权的阶级本质，因而与吴三桂的阶级利益格格不入，这是他降李复叛的根本原因。即使吴三桂当时投降了李自成，进入了北京，如果农民军不改变其既定政策、不向封建政权转化，吴三桂迟早还是要同他们分道扬镳，而陈圆圆的被夺则使这种结局提前发生了。也就是说，阶级本质的差异，是这一事件发展过程中潜在的必然因素，而陈圆圆被夺则是其中的偶然性因素，但是，它却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言，“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末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而历史“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④⑨}

三、必然的归宿与历史的结局

二次返回山海关，吴三桂直扑关城，抢夺根据地。由于变出意外，唐通等人毫无戒备，四月八日，被吴三桂“袭其守关兵殆尽，贼师负伤遁归，”^{⑤①}山海关重为吴三桂占领。这时，吴三桂已处于与两大势力的对立中。为了加强力量，他“陈兵演武场，请绅衿父老饷以牛酒，”^{⑤②}通过联络士绅，以取得地主阶级的支持。“招集溃散，及唐通降兵约二万”，^{⑤③}“新募兵数千，尤雄悍”，^{⑤④}以扩充兵马。同时，他“移檄远近讨贼”，^{⑤④}京城外亦遍张吴三桂檄，共约士民缟素复仇”。^{⑤⑤}并斩农民军使者李甲之首祭旗，割陈乙双耳纵归通报，声言“令李自成自送首来”。

然而，尽管吴三桂已经作了充分的准备，其兵力合山海关原有镇兵并新增兵已达六万余人，要对抗强大的农民军仍不过是以卵击石。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吴三桂意识到他将面临着场严酷的决战，事关生死存亡，而结局却是凶多吉少。所谓“见自成势大，难与争锋。”^{⑤7}此时的吴三桂迫切地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而这个支持者，自然是非清人莫属。可见，与农民军的决裂，已经把吴三桂推向了清人一方。

面临着大敌压境，吴军内部已开始议论向清人乞援一事。所谓“以众寡不敌为虑，有进乞师策者”。^{⑤8}“部将胡守亮素通满语，乃献借兵之策。”^{⑤9}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吴三桂不敢贸然行事。他请军师方献廷问策，曰：“敌众我寡，计将安出？”方献廷曰：“李自成大军必来取关，孤军难胜，莫若请北兵进关，共歼李贼，事成则重酬之。”^{⑥0}可见，当时在吴军将领中大多数人都认为，投靠清人乃大势所趋，既可逃避降清的负君之罪，又可藉他人之力达到复仇的目的，摆脱眼前的危急局势，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这实在是个万全之策。于是，他修书给清摄政王多尔衮，命副将杨坤、游击郭云龙为使，出关北向，前往清朝请援。

书中写道：“流寇逆犯天阙，……先帝不幸九庙灰烬。”“三桂受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拒守边门，欲兴师问罪，以慰人心，奈京东地小，兵力未集，特泣血求助。我国与北朝通好二百余年，今无故而遭国难，北朝应惻然念之，而乱臣贼子亦非北朝所宜容也。夫除暴剪恶，大顺也；拯危扶颠，大义也；出民水火，大仁也；兴灭继绝，大名也；取威定霸，大功也。况流寇所聚金帛子女，不可胜数。义兵一至，皆为王有，此又大利也。王以盖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会，诚难再得之时也。乞念亡国孤臣忠义之言，速选精兵，直入中协、西协，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灭流寇于宫廷，示大义于中国，则我朝之报北朝者，岂唯财帛？将裂地以酬，不敢食言。”^{⑥1}

其一纸悲愤激亢，与几天前走在投降农民军路上的吴三桂判若两人。但是，应当承认的是，这时的吴三桂并没有说要投降清朝，而仅仅是“借兵”。第一，他站在明国的立场，以明臣的名义，请北朝（清）出“义兵协助”攻打北京，雪亡国之恨，报君父之仇。第二，他规定了清军的入边路线，让其从中协、西协南下包围京师。中协，是指喜峰口、龙井关等处，西协，指墙子岭、密云等处，皆为清军入塞的老路，对清军并无战略价值，而将战略要地山海关仍然掌握在自己手中。第三，他许诺清人在事成之后“裂地以酬”，并非尽献中原国土。

但是，吴三桂欲联合清军攻打北京的计划还未待实施，李自成的讨伐大军便已先自京城席卷而来。

原来，李自成于北京得知吴三桂中途反悔，并击败唐通、夺回山海关的消息后，便决定亲统大军讨伐。四月十一日，他再次派出使者携吴襄手书与金银先往招抚，两日后，在宋献策、刘宗敏、李过等人的扈从下，率十万大军^{⑥2}出齐化门（朝阳门），向山海关奔来。明太子、永、定二王及吴襄也被带往军中。

慑于大顺农民军的浩大声势，吴三桂采纳了参将冯有威缓兵待援之计，即对农民军“收其财帛，散赐士卒”，“使彼不及备。”以故，吴三桂对来使表示：“愿一见东宫而即降”，^{⑥3}并派出李友松等六名山海关乡绅作为谈判代表，以拖延时间，等待清人对借兵作出反应，同时加紧准备。但无论怎样，吴三桂的处境都十分不利。且不说清人是否同意出兵，即使应约而来，也该自中协、西协入边，而此时李自成的大军恐怕早已兵临山海关城下。到那时，清军虽对李自成有所牵制，但对吴三桂来说却是远水不解近渴，仍会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坐以待毙。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为许多相互交错的意志所左右，并常常出现意外与巧合。大顺农

民军与清军都没有按照常规行事。

首先是，大顺农民军没有如期到达山海关。

从北京到山海关，大约有七百里的路程，对于能征惯战的大顺军来说，只要三至四天的急行军即可到达，但李自成一行整整走了八天，失去了歼灭吴三桂所部的最有利时机，使吴三桂赢得了充裕的时间等待援军。

其次是，清军没有自中协、西协入边，竟直奔山海关而来。

此前，清人并不知道形势的发展已为他们提供了最有利的时机，但大顺军在中原的迅猛发展无异使他们受到震动。他们不甘心在这场争夺天下的斗争中败下阵来，于是把斗争的目标由明王朝转向了农民军，所谓“我朝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耳！”摄政王多尔袞接受了范文程、洪承畴等人的建议，欲乘农民军进入北京、朝中混乱之机，从蓟州、密云近京处入边，与农民军决一雌雄。四月九日清军自沈阳出发，十五日到达翁后（辽宁阜新境内），便遇到了吴三桂的使者杨坤和郭云龙。二人将吴三桂的书信递上。

多尔袞得书，虽惊喜交集，却十分冷静。他复信吴三桂说：“予闻流寇攻陷京师，明主惨亡，不胜发指。用是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誓不返旌，期必灭敌，出民水火。及伯遣使致书，深为喜悦，遂统兵前进。夫伯思报主恩，与流寇不共戴天，诚忠臣之义也！伯虽向守辽东，与我为敌，今亦勿因前故，尚复怀疑。……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一则国仇得报，一则身家可保，世世子孙长享富贵，如河山之永也。”^④

很显然，多尔袞的答复与吴三桂的请求完全是两回事。他虽声称自己这次入边，正是“率仁义之师”，“期必灭贼，出民水火。”对吴三桂向他借兵求援“大喜，许诺”，^⑤却提出了附加的条件，这就是让吴三桂投降清朝。随后，他统领清军改变行军路线，向山海关奔来。

大顺军没能疾驰赶往山海关，多是犯了麻痹轻敌的错误，既没有注意到关外清人的举动，更忽视了吴三桂联合清军的可能。自以为以十万大军对付山海关弹丸之地，可稳操胜券。结果，使力量的对比因时间的拖延而发生了转变。

清军直奔山海关的原因，也不外乎三个方面：其一，多尔袞以吴三桂与之仇杀多年，且始终拒绝招降，对他的借兵之举持有疑虑。所谓“欲探其言之虚实，遣妻弟拜然与汉将一人（郭云龙）偕往山海关，将一人（杨坤）则留军中，”^⑥作为人质。所以，直奔山海关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搞清吴三桂“借兵”的虚实。其二，多尔袞欲趁机招降吴三桂，占领山海关。在伐明战略上，多尔袞虽然没有皇太极那样重视山海关，认为可从山海关以西长城各口深入内地，直取北京，但他同样认识到山海关对清人的重要和攻之不易。如今吴三桂主动提出“借兵”，实乃千载难逢之机。故而，他在给吴三桂的复信中明确提出要吴三桂率众归顺。而直奔山海关，正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其三，借吴三桂之力打击农民军。多尔袞此次出兵，本来就是要同农民军决战的，吴三桂借兵正好给他提供了一次机会，因而他在信中要吴三桂“诱贼速来”，^⑦一方面可与农民军决一高低，另一方面还可借吴三桂的力量，坐收渔人之利。

总之，由于大顺农民军的误期和清人改变行军路线，使事态发生了转变。四月十九日，吴三桂在得到李自成的大军已至永平的消息后，便连续两日与诸将、乡绅“歃血同盟，戮力共事，”^⑧并在城西石河一带设防布阵，整个山海关戒备森严，一场大战爆发在即。吴三桂期待援军之心切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对清人直奔关门的举动，自然是喜出望外。因而，吴三桂得到多尔袞的回音后，又发出第二函书信，曰：“接王来书，知大军已至宁远，救民伐暴，扶弱除强，义声震天地。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而三桂之感戴犹小也。”“今三桂已悉简

精锐，以图相机剿灭，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首尾夹击，逆贼可擒，京东西可传檄而定也。又仁义之师，首重爱民，所发檄文最为严切，更祈令大军秋毫无犯，则民心服而财土亦得，何事不成哉！王得书，即星夜进发，逾宁远次于沙河地方。”^⑨

吴三桂在这封信中谈了三点：第一，称清军为仁义之师，认为“其所以相助者，实为我先帝”。第二，接受了清军直入山海关的事实，所谓“幸王速整虎旅，直入山海。”但同时又规定清军逾宁远后，次于沙河，仍没让其径直入关。第三，要求清军申明军纪。而对多尔袞劝降，依旧没有表示。

四月二十日，多尔袞于连山再次遇到吴军来使郭云龙、孙文焕，并收到吴三桂的第二封信。当时清军尚未到达宁远。但是，览信后，“九王（多尔袞）即发驰行”，“一行皆未及打火矣，达夜疾驰，人马饥渴，黄埃涨天，夜色如漆，人莫开眼，咫尺不辨。”^⑩二十一日晚，清军到达山海关外，距关城尚有十余里，“一昼夜之间行二百里矣。”^⑪多尔袞仍然没有如吴三桂所请次沙河待召。可见，无论是吴三桂，还是多尔袞都在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要使一方服从另一方，还有待形势的发展。

清军到达山海关时，吴三桂与农民军已搏战了一整天了。是日（二十一日）清晨，李自成率农民军比多尔袞先抵山海关，在石河西岸与吴三桂对阵，又命唐通率领一支人马由城外西北三十余里的九门口出北向东包围关城，切断了吴三桂投奔清人的退路。然后，命吴襄阵前劝降。然事已至此，吴三桂不欲反顾，他“作书绝父”，声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桂与父诀，请自今日。父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傍以诱之，桂不顾也。”^⑫于是，一场激战首先爆发于石河。对于农民军来说，这是夺取北关锁钥，挡住清兵进路，巩固在北方所建立的统治政权的关键一战，而对吴三桂来说，也是决定生死存亡、性命攸关的背水一战。因而，双方皆拼死力战。大顺农民军显然具有相当的优势，他们很快突破了石河防线，开始攻城。先是，大顺军以一支精骑，由西北角山“飞奔透阵，至西罗城北，方欲登城，守城兵用炮击之，又遣偏将率兵还剿”，才挡住农民军的攻势，使之“不复来战，相持竟日，遂收兵。”^⑬与此同时，北冀城外的抢夺战也相当激烈。据当时吴军守城将领副总兵冷允登叙述说：“当王师（清军）之未至，正流寇之突关。亲王（吴三桂）领兵当锋，派臣守北城。奈此城通山受敌，贼欲联络直下，故独日夜狠攻。”“贼势蜂拥，竟扑边城直上。臣只率亲丁尽力死战”，并请吴三桂拨兵增援，方守住此城。^⑭而“东罗孤当贼冲，危急劳瘁，倍于两城”。^⑮可见，山海关的几个辅城均已险些被农民军攻破，如果再战，吴军势必抵挡不住。但就在这紧要关头，清军兵抵关外，吴三桂立即派人往请。

多尔袞几乎是刚刚到达山海关外，便得到“吴三桂哨骑来报，贼已出边立营”。^⑯于是，他命清军马不停蹄率精锐疾进，于一片石击败唐通所部，打通了山海关外的道路。二十二日早上，清军继续西进，直至威远堡。这里距关城还有二里路，多尔袞命令清军“驻营于欢喜岭，高张旗帜，休息士卒，遣使往三桂营觐之。”^⑰这时，农民军又开始攻城，攻势更加猛烈。吴三桂见清兵坐观城外，“复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信，请之者三，九王始信，而兵犹未行。三桂遣使者相望于道，往返者凡八次。”^⑱由此可见，吴三桂此时的处境已十分危险，而多尔袞显然要使吴三桂陷入穷途末路后，再迫使其俯首就范。

在农民军的强烈攻势下，吴三桂终于招架不住，他亲自带领吕鸿章、余一元等五名乡绅和二百名亲军，在城上炮火的掩护下，向东北方向突围出城，驰往清营求助。随后，在清军的大营里完成了明清之际最具影响的一次谈判。

这次谈判，实则有关吴三桂是否降清，以及如何降清的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有关谈判的内容，官方没有留下可靠的记载，而私家著说又多有歧异。如《渡闻续笔》曰：“桂念腹背受敌，势不得全，乃与清帅约云：‘从吾言并力击贼，吾取北京归汝。不从吾言等死耳，请决一战。’问所欲，曰：‘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黄河为界，通南北好。’清帅许之，操刀说誓，而以兵若干，助桂击贼。”⑨《甲申传信录》曰：吴三桂“驰入满洲壁中，见满洲九王。九王曰：‘汝约我来，我来何用炮击？’三桂曰：‘非也。闯兵围关内三面甚固，又以万骑逾边墙东退归路，故用炮击之使开，可得间道东出也。’九王曰：‘是也。然无盟誓，不可信，且闯兵众，关内兵几与闯同，必若兵亦剃发殊异之，则我兵与若俱无惮矣。’三桂曰：‘然。然我固非怯也，徒以兵少止数千。使我有万骑，则内不患寇，外犹可以东制辽沈，我何用借兵于若为？今兵少固然，剃发亦决胜之道也。’于是与九王共歃血。三桂即髡其首，以从。”⑩民国年间所修《临榆县志》，则记载了多尔衮的态度。多尔衮当时表示说：“汝等欲为故主复仇，大义可嘉，予领兵来，成全其美。”

上述记载，差异很大，但却仍然可以找出一些共同之处，借以理清谈判的大致情形。能够肯定的是，最初吴三桂仍然站在明朝臣子的立场上向清人借兵，在答应酬谢的同时，又附加了一些要求，而且并无奴颜卑膝之色。但这仅仅是事情的一半。多尔衮老谋深算，软硬兼施。先是以援而不救，使吴三桂在军事上陷于绝境，达到夺人之威的目的。接着，在谈判过程中，他在满口答应出“仁义之师”的同时，很可能是采取了诱降的手段。即接受了诸如“立明太子”、“黄河为界、南北通好”之类的要求，但却提出要吴三桂剃发作为交换条件，而名义上只说是与农民军分出殊异。在这种情况下，吴三桂不可能拒绝清人，形势的危急，也不容许他作更多的考虑。因而，吴三桂接受剃发，是当时唯一可能的选择。也正如他自己所言，“剃发亦决胜负之道也。”而接受了剃发，又是他走上降清道路的开始。

清人惯以剃发作为顺逆的标志，凡投降归附的汉民都必须剃发。自天命三年（1618年），努尔哈赤第一次伐明、袭取抚顺，这一政策就推行到被俘的汉人中，游击李永芳并“抚顺被虏军丁八百余人，尽髡为夷”。⑪此后，无论是孔有德、耿仲明航海来归，还是洪承畴、祖大寿战败投降，都要首先剃发。入关后，剃发令通行全国，明令剃发者为民，逆命者为寇。在招抚大顺农民军及南明余部时都以剃发作为根本条件。如顺治二年（1645），清朝总督八省军门、统辖文武的佟养和谕令大顺将领李过、刘体纯曰：“我朝新制度剃发为一统，倘不然，而不剃，是溷之也。”“若能剃头，当即允抚”。⑫可见，剃发与否，所关重大，它是降顺与反叛的分水岭。因而，吴三桂接受剃发，虽出于迫不得已，却是他投降清人的标志与证据。

吴三桂的降清，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

第一，清军入关。吴三桂自清军大营返回关城后，立即命令全体官兵一律剃发。一时不及者，以白布斜束项背。⑬然后，“三桂开门迎降，我军遂从南水门、北水门、关中门入。”⑭“九王受拜礼于阵中，进兵城中”。⑮山海关是明朝的东边门户，夺取山海关，便可长驱直入中原。这是清朝统治者多年梦寐以求的夙愿。

第二，击败农民军，进占北京。自明亡之后，清人便确定了与“流寇”争天下的战略目标。但在多尔衮等人的眼里，农民军远比明朝强大得多，他说过：“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大过于人者。”⑯可见，清人已经意识到，在两强相斥中，要想击败农民军，绝非轻而易举。然而，吴三桂的降清却改变了力量的对比。首先是解除了清军的后顾之忧。如果按照清军原有的计划，自京都北部密云等处入边与李自成争战，则前有京城雄师，

后有山海关精锐，清军有腹背受敌的危险。其次，击农民军于无备之中。由于吴三桂的降清，清军与农民军的首次交战在山海关展开。清人可谓知己知彼，多尔袞在观阵后对诸将说：“尔等勿得越伍躁进，此兵不可轻击，须各努力，破此则大业可成。我军可向海对贼尾鳞次布列，三桂兵可分列右翼末，”^①战前进行了严密的部署。然而，农民军却对清军的参战茫然不知。当八旗兵趁农民军与吴军酣战时驰入战场后，农民军对于阵上突然出现的辫子兵大为骇然，惊呼“满兵来矣！”^②李自成挥盖先走，农民军阵脚大乱，一败涂地，在清军的追杀下，“尸横八十余里，马无置足处。”^③山海关之战，是清朝定都燕京，完成一统基业的关键一战，尽管其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都不可忽视吴三桂降清的重要作用。而山海关战后十天，清军便进入了北京。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产生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④李自成出兵山海关，本为收降吴三桂，却使吴三桂投降了清人。吴三桂欲借兵清人，却反被清人所用。多尔袞原想自北边入京与农民军决战，却在山海关一举获胜。尽管他们都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但却“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从而导致了最终的结局。

①《明清史料》甲编，第10本，969页，兵部行辽东巡抚方一藻题稿。

②《明清史料》甲编，第1本，24页，蓟辽总督洪承畴题本。

③④⑤⑥⑦《平吴录》载《辛巳丛编》。

⑧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8，洪承畴降清。

⑩《清史列传》卷78，洪承畴传。

⑪⑫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5，锦宁战守。

⑬《明清史料》丁编，第7本，675页，兵部抄出按察司金事姚恭题本。

⑭⑮《清太宗实录》卷57，第29页。

⑯《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31页，宁前道石凤台塘报。

⑰⑱⑲《吴耿尚孔四王合传、平西王吴三桂》，载《明季稗史初编》卷26。

⑳㉑《清史稿》卷474，吴三桂传。

㉒《明清史料》乙编，第4本，360页，遵旨看议关于祖泽溥痛愤松山夜溃等情疏残稿。

㉓《崇祯长编》卷52。

㉔㉕㉖《清太宗实录》卷60，第5页，第6页。

㉗㉘《清史稿》卷234，祖大寿传。

㉙《清太宗实录》卷64，第6页。

㉚《清史列传》卷78，唐通传。

㉛㉜㉝钱軾《甲申传信录》卷8，吴三桂入关之由。

㉞㉟㊱彭孙贻：《平寇志》卷10。

㊲㊳王永章：《甲申日记》。

㊴李清：《三垣笔记》附识中、崇祯。

㊵《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传。

㊶㊷张怡：《渡闻续笔》卷1。

㊸程源：《孤臣纪哭》。

㊹㊺㊻钱軾：《甲申传信录》卷8，借兵复仇。

- ③⑨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廿五癸丑挟夹百官。
- ④⑩⑪钮琇：《圆圆传》。
- ④⑪彭孙贻：《山中闻见录·建州》。
- ④⑫陆次云：《圆圆传》。
- ④⑬⑭《吴三桂纪略》载《辛巳丛编》。
- ④⑮王朝：《甲申朝事小记·圆圆传》。
- ④⑯⑰⑱⑲⑳㉑刘健：《庭闻录》卷 1。
- ④⑲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393 页。
- ⑤⑰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 78，李自成之乱。
- ⑤⑱⑲⑳㉑计六奇：《明季北略》卷 20，吴三桂请兵始末。
- ⑤㉑抱阳生：《甲申朝事小记》卷 5，吴三桂始末。
- ⑤㉒⑤㉓⑤㉔⑤㉕⑤㉖⑤㉗⑤㉘⑤㉙⑤㉚⑤㉛⑤㉜⑤㉝⑤㉞⑤㉟⑤㊱⑤㊲⑤㊳⑤㊴⑤㊵⑤㊶⑤㊷⑤㊸⑤㊹⑤㊺⑤㊻⑤㊼⑤㊽⑤㊾⑤㊿《清世祖实录》卷 4，13—14 页；第 15 页；第 16 页；第 15—16 页；第 16 页；第 19 页；第 19 页。
- ⑤㊿关于李自成率军攻打山海关的人数，本文从王兴亚《李自成起义史事研究》书中的考订。
- ⑥⑰冯梦龙：《燕都日记》。
- ⑥⑱⑲⑳㉑李滢：《沈馆录》。
- ⑥㉒⑥㉓⑥㉔⑥㉕⑥㉖⑥㉗⑥㉘⑥㉙⑥㉚⑥㉛⑥㉜⑥㉝⑥㉞⑥㉟⑥㊱⑥㊲⑥㊳⑥㊴⑥㊵⑥㊶⑥㊷⑥㊸⑥㊹⑥㊺⑥㊻⑥㊼⑥㊽⑥㊾⑥㊿光绪《临榆县志》卷 9，舆地篇，记事。
- ⑦⑰《明清史料》丙编，第 5 本，414 页，山海关副总兵冷允登启本。
- ⑦⑱《明清史料》丙编，第 5 本，449 页，平西王下马维熙等揭帖。
- ⑧⑰陈继儒：《剿奴议撮》。
- ⑧㉒《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53 页。
- ⑧㉓恩格斯《致约·布洛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478 页。